

广州起义前后的杨殷

□邵雍

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是我军初创时期的三大起义之一，杨殷是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张太雷牺牲后，他曾经出任广州苏维埃代理主席。重新探讨杨殷在广州起义前后的事迹，对于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有着重要的意义。

—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接着广州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大批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遭到屠杀，至此大革命已基本被葬送。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征服，“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杨殷就是这个光荣队伍中的一员。

党的八七会议决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等领导南方局。周恩来等未到之前，由张太雷、杨殷、黄平组织临时南方局，负责准备并指导暴动及一切政治军事事宜。1927年10月16日广东省委向中央报告南方局和省委联席会议经过情形，以及改选后南方局、省委成员名单。南方局由国际代表指定张太雷、周恩来、恽代英、黄平、杨殷、彭湃6人为委员；在南方局下设军事委员会，指定周恩来、张太雷、黄平、赵自选、黄锦辉、杨殷6人负责。杨殷还兼任广东省委委员，负责工委工作。

这年中秋节前，杨殷派秘密交通员李少棠（女）带炸药和炸弹壳坐船去九江，教人翻制炸弹，经过几次试验，炸弹的威力不错。杨殷听取汇报后大笑地说：“好哇！这是准备广州暴动时送给反动派尝的礼物。”与此同时，杨殷指示从上海辗转回到香港的杨广就地建立地下联络站并负责省委机关刊物《红旗》在澳门与广州间的运送工作，“为确保刊物的安全，由杨殷交往香港澳门轮船上的海员负责接应”。10月底杨殷还指示从港澳潜回广州的曾伟赞做联络铁路工人的地下工作，并联合印务及理发等工会举行示威，以探听汪精卫对工人的态度，结果葵园示威揭穿了汪精卫、张发奎的反动真面目。

11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杨殷负责总指挥部参谋团的工作，收集情报，在叶挺未到广州之前，协助军事技术的指导和制订起义的行动计划。他还把广州分散的手车、铁路、汽车等各行业的秘密工人武装统一组编为工人赤卫队，自己负责指挥西路起义军。同月，杨殷了解到周文雍被捕后的处所，经过周密安排，通过打入公安局当特别侦缉的黎胜等人将周文雍救了出来，使他能够及时参与广州起义的组织工作。

12月初广东省委机关召开动员会，大家都准备回广州参加暴动。这时，杨殷交杨广带往澳门付印的除了《红旗》之外，还有为广州起义准备的宣言、文告和传单。“约在六、七日，杨殷先回广州，临行前他嘱我把《红旗》付印后便回广州去。”12月7日杨殷在禺山市场陈少泉杂货店二楼举行的工农兵代表会议上说：“就这样决定，南海农民赤卫军两个团归南海县委书记陈道舟同志领导。广州起义信号发出后，农民赤卫军第一团团团长周侠生同志，负责协同广三铁路工人赤卫队进攻路局和芳村、花地警署；得手后，回师拿下大沥，再会合农民二团团团长吴勤的队伍，打下佛山，控制广三路，巩固广州外围。”在此之前，杨殷还指示曾伟赞在黄沙将军庙后街仁和里（现在粤汉路广州南站）七号木履店内建立秘密机关，联络这一带的失业工人。12月10日清晨，杨殷在广州黄沙阶砖巷的一间小屋里主持会议，传达革命军事委员会行动提前到12月11日的绝密指令。会上有人急问道：“我们来得及吗？”杨殷神态安详地回答说来得及，刀柄还没有给他们抢去哇！麻烦当然麻烦，甚至要准备闯险！准备失败！可是我们要是怕这些还要革命吗！下午，他在叶挺召开的参谋团军事会议上详细报告了参谋团掌握的情报，称“三个钟头便可以拿下广州”。在谈到何时打河南时，杨殷同意叶挺“打下河北再过去不迟”的意见，并接着说：“我们手里拿着‘天九至尊’，难道杀不

倒他的‘三武鹅五’？”他还提议：“除了硬打，我们向敌人来个政治攻势如何？把所有的共青团、劳动童子团、青年学生组织起来，仗一打响，即在全市各地高唱《国际歌》和革命歌曲，叫敌人陷入‘四面楚歌’之中！”这一提议为会议所采纳，作为决议交由各战线同志回去执行。当晚，他召开西路起义军会议，进行具体的起义部署，强调“起义队伍要勇敢机智，立即肃清反革命，防止敌人破坏”。当晚，杨殷指示曾伟赞监视铁路的反动分子，防止他们破坏铁路，曾伟赞联络了数十名失业工人，配备约 10 支手枪，执行任务。

总之，在广州起义前杨殷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情报工作、地下交通、印行党刊、发动工运、联络农军、试制炸弹、营救干部、策划起义、具体部署等无不亲力亲为，在腥风血雨中脚踏实地，在白色恐怖下埋头苦干，竭尽全力为广州起义的发动创造较好的条件，作出了别人难以替代的贡献。

二

1927 年 12 月 11 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在广州起义中正式成立时，杨殷担任人民肃清反革命委员。广州苏维埃政府首次会议讨论并作出决议的事项之一就是“建立革命秩序，严厉镇压反革命”。会后，杨殷下令处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并通知各路起义军加强肃反工作，维持革命秩序，控制交通。“广州苏维埃政府还发布一道命令禁止国民党的存在……宣布通缉国民党领袖，一般劳动民众得以随处逮捕，就地正法……并发布命令宣布国民党政府人员的死刑，严加通缉。”

为了镇压反动派的反抗，“肃反委员会便将办事处设于财政厅原址，加紧捉拿反动派，并命令起义队伍，对凡系反对工农民主政府的反革命分子，立即加以逮捕。”杨殷领导的肃清反革命委员会，“为歼灭反革命派、工贼、走狗、奸细等的机关。工人表现真正布尔塞维克的精神，努力歼灭并逮捕著名的剥削者、反动派、警察、奸细、走狗、工贼、官僚、反革命派国民党的军官”。

被起义军从监房中救出的海员工人黄养回忆说，“我领枪后，在公安局见那些残杀过革命同志的白狗——督察、侦缉、警官，没逃掉的都被押来了。由于我熟悉监仓，便由我带领和指点关押反动分子……后来大家便推举我当看守。我们是不轻易杀人的，但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坏蛋绝不姑息。由于在伪公安局当杂工和炊事员的人的检举，我们毫不犹豫地当场镇压了一个双手沾满人血的警官。”

当天上午 9 时许，在惠福分局对门站岗放哨的赤卫队员分头截获了两个可疑分子，在他们身上搜出了国民党的文件，于是立即把他们押送到总部。“到了总部大门，有几个从狱中出来的同志围了上来，认出这是两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一个是一双手沾满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刽子手。同志们愤怒地扑过去，把他推倒在地，射出了复仇的子弹，讨还了血债。”

当事人梁若尘回忆说，在设在公安局的临时苏维埃指挥部内“看见一位担负肃反任务的同志，一手拿着盒子炮，一手抓着捆绑犯人的绳索，往大门出去。犯人走在前，他在后押着。只听见犯人用几乎听不见的低音说：‘我不是士的党，你要问清楚。’那位同志轻蔑地斥责说：‘昨天你不是很威风吗？今天为什么装得那样的善良了。’后来，我走到一条横巷，看见十几个群众在围看一对刚被镇压的中年夫妇。女的已断气，男的伏倒在石板上，看上去还在搔动。群众中有的愤怒地说：‘这就是假装斯文的豺狼沈藻修。清党时杀害学生、教师不知多少。’最近阅读文史资料才知道那横巷叫司后街口，被镇压的原来是住在那里的，当时企图偷跑，卒被就地枪决的。”沈藻修时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清党委员、法院院长。他们夫妇是 12 月 12 日一早在家里被青年赤卫队抓走的，原本要送苏维埃政府处理，途经青年赤卫队队部时被海员赤卫队队员枪毙。与此同时，青年赤卫队队长带领一部分队员逮捕了中山大学的反革命分子梁展昌、张资江，解送苏维埃政府追查处理。被解送苏维埃政府追查处理的还有《民国日报》的袁总编辑。此人在蒋介石叛变后一直写文章骂共产党，不料在路上被中山大

学学生认出逮捕。“当天晚上，苏维埃政府门前贴了一张大布告，枪决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事实上，团市委在黄花岗后面的二望岗召开过 200 多名团积极分子骨干会议，会后团员们完成了杨殷交给他们的肃反任务。

广州起义方兴未艾之际，外县土匪袁虾九之流乘机混进市内作案，纵火抢劫永汉南路高第街一带，以冯赞为队长的工人赤卫队“奉命驰往灭火及镇压敌匪，以保护市民生命财产。”

不过，整个广州起义期间肃反镇反的数量并不大。根据一亲历者说：“这一次起义，事后根据各方面的调查和估计，敌人方面，整个过程死者才不过 100 多人，包括士兵和军官、工贼和所谓清党委员等。另外还有扣押下来听候审讯的敌方人员约 200 人，但到起义失败时来不及处理，都乘机逃脱，参加了反扑。”1927 年 12 月 28 日李立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称：广州暴动“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占据广州三日，杀人不到一百，捉了的人，都需经过惩治反动派委员会，审过后才肯杀，因此退走时，还关有七八十个反动派在牢里。失败后，便出来引导军队大杀我们了。在暴动时，一切当时的军事、政治领袖都在东山（除李福林外），可以一网打尽，但是当时指挥机关不肯发兵去东山，以为抓到政权便够了。”以上报告基本属实，但他断言“全未执行镇压反革命派的工作”则明显言过其实了。

当时在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工作的赖先声指出：广州起义爆发后不久，总体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市区内尚潜伏着许多零散的反动军警和商团武装，一时来不及肃清，他们随时在街坊屋顶上、楼窗中放枪对我们袭击。领导广州起义的张太雷同志就是不提防受这种袭击牺牲的。”聂荣臻后来认为，就 12 月 12 日中午张太雷去西瓜园出席工农兵大会这件事来说，“对警卫工作没有注意，结果却给敌人冷枪打死了。太雷同志的牺牲，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其实那天开会时，会场外围已经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妄图破坏会场，工人赤卫队对此虽有发现，也仅仅加以监视而已。在西濠口太平南一线赤卫队坚守阵地，13 日，“潜伏下来的机器工会体育队和工贼流氓，冒充赤卫队，占据了太平南路嘉南堂八楼”，用机枪居高临下扫射，赤卫队上下受敌，只得且战且走，退到西瓜园和惠福路一带。起义军某部炮连第三排连夜转回观音山，途中也有“潜入和潜伏的反动分子在做破坏活动，各路口、各山坳，时常发出冷枪”。由此可见，肃反镇反不严也是导致广州起义失败的主要因素之一。

当然，肃反是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不可不慎重。相对来讲，在军队中革命反革命壁垒森严，政治立场大家看得很清楚。因此，各部队在起义一开始就果断处决了一些反动军官，为士兵起义扫清了障碍。如叶剑英掌握的教导团一开始就处死了参谋长兼代理团长朱勉芳，“并将不久前接任的第一营营长方际平、第三营营长樊少卿等反动军官和暗藏在连队里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共 15 人逮捕起来，一并予以关押”，旋即枪毙。警卫团也是如此，“团长首先肃清内部一切反动分子并解除一些部队的武装后，立即派兵执行党的决议，宣布武装起义”。但是对于百姓特别是工人中的反动分子（如工贼李德轩操控的广东机器总工会及其“体育队”的骨干）哪些应该逮捕、哪些应该处决，事先并没有进行仔细的调查，自然更无预案。根据黄平的回忆，“暴动前，革命军事委员会已决定要叶挺领导军事，杨殷领导肃反。他们当时都在香港，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为他们可以在暴动前几天回广州就可以了，早回来有半点被捕的危险，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因为暴动不是一件简单事情，拿上手就能做的，而是需要每个参加者，尤其是负责人，事先详细研究讨论的……杨殷在肃反工作上也使人感觉他不够积极，这也难怪。肃反是一件需要仔细准备的工作。他来到广州不到一两日就暴动，哪里有时间来筹备呢？”这里黄平的回忆与史实略有出入，根据前文所述，杨殷至迟 12 月 7 日已到广州，此时离广州暴动还有四五天而不是“一两日”。当然对于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政策性又很强的肃反工作来说，即便有四五天时间也是不够的。问题还在于杨殷没有也不可能把他的所有时间都放在肃反上，他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再说，起义不久总体态势是“敌强我弱，敌攻我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起义军

一方即使有意也无力肃清潜伏在市区的反革命分子，真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这种大势，杨殷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斗争上。12月11日公安局被攻占后，杨殷亲自给闻讯而来要求参加战斗的工人群众和出狱的同志编队，把枪交给队长去分发。上午7点，杨殷吩咐施展等人巡看各地尚未拿下的据点。他还布置参加攻打公安局的铁路工人敢死队迅速返回广三、粤汉、广九等路，占领和守住车站，切断敌人运输，阻滞敌军反扑广州，同时调机车接运郊区农军进城，援助起义军。中午他在公安局内召见黄平民，要他立刻带三四个同志去贤思分局，指出“那里是真空。不过，要警惕敌人的诡计”。黄走后，杨殷又要黄平民的工作搭档李少棠也去，“叫黄平民注意，检查一下周围的环境，有没有后门和后路，以防万一”。可以说，杨殷的一些军事布置是必要的周密的，对于扩大和巩固广州起义的胜利成果是有一定作用的。据上海报纸报道：“黄琪翔欲调兵回广州，各铁路均在共党手中，运兵甚难。”

12月13日在敌军已逼近公安局的情况下，一直坚持指挥赤卫队作战的杨殷才被迫率十几名赤卫队员突围撤出广州，前往海陆丰，与彭湃等人一道继续坚持和扩大海陆丰的武装斗争。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事后杨殷在党内刊物《红旗》发表广州起义的回忆时通篇没有提及他在广州苏维埃政府中担任的肃反委员工作，但对敌人重占广州后的暴行多有揭露：“进城时著名土匪的李福林军队及薛岳新编的土匪，乘机放火、抢劫，被难者何止千家。更逞其凶残，逢人便杀，因勒索不遂而被诬为共产党者为数甚众。反动区长郑某亦被枪毙。更将工友包围屠杀至三千余人，尤其是红花冈、东教场、观音山三处，每处五六百人，用机关枪扫射……十六七八日仍继续其杀人抢劫的生活，尸骸遍地，血流通渠，用汽车运送至十八日始得完竣。女子被杀后加以剖心剥腹”。

广州脱险者卢必孚回忆说，“敌军进城后，对我广州军民大肆洗劫和屠杀，全城搜捕起义人员，凡衣领上有红色痕迹的，不分男女老幼，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害，从珠江长堤到执信学校，沿途堆积的尸体如山，血流成渠”。又有人回忆“市民被敌方杀害的人也有二三百人”，“甚至连穿红衣服的新娘子，也被推到火里烧了”。“反动军警还强迫被捕的革命群众在市内收尸，用大板车运送到马棚岗一带挖深坑掩埋。最后，连挖坑的群众连同革命者的尸身一起，被埋进坑内”。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与起义军占领广州后肃反镇反不力也有较大的关系。

总之，在广州苏维埃任职的短短几天内，杨殷参与领导军事斗争功劳很大，但也确实存在肃反工作不够得力的缺点错误。参与领导军事斗争扩大与巩固了广州起义的胜利成果，而肃反镇反不力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在军事斗争方面的贡献。

三

1928年1月初，广东省委在香港召开了全体（扩大）会议，李立三采取惩办主义。他没有给杨殷、周文雍、叶挺、陈郁等同志以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就匆忙作出决定开除黄平、周文雍、陈郁、杨殷、恽代英、吴毅等的省委委员等职务，并给予留党察看3个月或调做下层工作等处分。其中对杨殷处分的理由是“担任肃清反革命委员会未执行任务”，“调做下层工作，并决定开除省委委员”。

平心而论，杨殷担任肃反委员是做过一些工作的，虽有明显的缺点与不足，但尚不至于“未执行任务”。杨殷当时虽不同意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但他不计较个人委曲荣辱，任劳任怨全力以赴地处置起义的善后工作。广州起义失败后，杨殷嘱咐李少棠把黄平民接到娘家暂避，全家大小都按李的嘱咐称黄为表亲，没有引起过到家搜捕的敌人的怀疑。黄平民脱险后，出任南路特委书记。他还积极接待安置到港的同志，安慰他们说广州起义中牺牲的烈士的鲜血不会白流。由于党中央及时纠正了“左”的惩办主义错误，1928年4月13日杨殷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又当选为省委委员。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上杨殷当选为中央委员，

六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候补委员，并任中央军事部部长。会后杨殷回国，在上海党中央工作，11月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直到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被捕牺牲。这些党内职务的不断提升，某种程度上也是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对杨殷包括广州暴动在内的工作业绩的肯定与褒奖。

“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过去一个阶段所进行的英勇的后卫战”，连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并称人民军队初创时期的三大起义。杨殷在广州起义中有功劳也有错误，但总的来说是功大于过的。周恩来在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同志牺牲不久写的《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指出，彭、杨、颜、邢四烈士是“积了无数次的斗争与战绩，从广大的群众中涌现而锻炼出来的”“革命的领袖”。他们的牺牲“是中国革命、中国党之很大的损失！”我们认为，这也是党中央对杨殷个人的最终定论。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

中山党史